

马克思恩格斯经典著述中的 “传统文化”析论

——兼论“第二个结合”的原理性贡献

范嘉祥 杨增崇

【摘要】马克思、恩格斯所提供的理解“传统文化”与“文化传统”的立场、观点与方法,是科学把握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问题的理论基石。文化作为社会有机体的组成部分,自身有相对独立的发展规律,与处于决定意义的经济基础和各类上层建筑有着复杂的辩证关系。基于这一理论前提,马克思、恩格斯认识到传统文化是精神文化生产的必要材料,继承与发展的方向根本由新的意识形态体系所决定,一旦置于新的社会形态,就具备了与原初形态相区别的内容与形式。“第二个结合”继承和发展了这些原则与观点,在发展马克思主义的规律性认识、造就新的文化生命体的理论指导和塑造新文明形态的思考等诸多方面,蕴含着丰富的原理性思想,是增强历史主动、坚定文化自信自强的根本所在。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传统文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第二个结合”

【作者简介】范嘉祥,北京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杨增崇,北京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北京 100875)。

【原文出处】《思想理论教育》(沪),2024.2.40~46

【基金项目】国家青年人才支持项目“当代中国社会思潮的基础性问题及其脉络体系研究”、北京市宣传思想文化青年人才资助项目“新时代意识形态错误思潮的特点及应对研究”。

“什么是传统文化、如何认识和对待传统文化、传统文化对于当代有怎样的意义”是理解传统文化所要回答的基本问题,也是关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以下简称“第二个结合”)是否能够科学展开的必要前提。研究“第二个结合”,要回到马克思、恩格斯的经典文本,澄清其提供的看待传统文化与文化传统的立场、观点与方法,以及深刻阐释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原理性理论成果”。^[1]学术界在关于马克思、恩格斯文化观的研究方面形成了诸多成果,同时也应注意到,马克思、恩格斯文化观中既少有系统关涉“传统”的内容,又与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视域中的“传统文化”有着不同语境。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话语中的“传统文化”主要指形成于中国古代社会的思想文化。由于东方社

会在经济政治发展上同西欧资本主义具有不同的历史背景与发展特点,马克思、恩格斯所指涉的“传统”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或“中国传统文化”并不具备直接等同的条件。但马克思、恩格斯相关论述中蕴含的科学思想原理是挖掘运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深厚精神内核的理论武器。^[2]马克思、恩格斯澄清了文化批判的立场,树立了理解传统文化的科学原则和方法论,在此基础上,一系列关于意识形态话语、精神生产材料、传统观念的论述和观点也都对科学认识“传统文化”有原理性的支撑。对此进行梳理总结,有助于廓清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认识,借以批判对“第二个结合”内涵的误解或歪曲,体现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大理论贡献。

一、马克思、恩格斯经典著述中释义“传统文化”的理论视角

马克思、恩格斯释义“传统文化”的基本观点之所以是科学的,首先在于其具备认识传统文化的科学立场与方法。传统文化问题一旦停留在文化内部就会遮蔽文化的本来面目,陷入抽象与空想的泥潭。马克思、恩格斯将文化批判上升为总体批判,采取了全新的理论视角,使文化问题在社会总体结构中得到说明,科学的传统文化观点也就随之“浮出水面”。以唯物史观为基石,马克思、恩格斯对文化的阐释从生成论、认识论、价值观等维度上确立起理解“传统文化”的总体逻辑和基本原则。

1. 在生成论上,从现实的个人及其物质生产生活实践出发,实现文化观的革命性变革

马克思创立的历史唯物主义揭示了人类社会由低级向高级逐渐发展的历史规律,从而将文化发展问题还原为人类社会 development 问题。在思想史上,这实际上经历了一个本体论的转向,马克思通过哲学革命将文化观念由“本体论”意义还原为“生成论”意义上的本相,^[5]将历史从“意识形态的繁茂芜杂遮蔽”中呈现出来:“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然后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等。”^[6]正是经由人类历史发展规律的前提性澄明,文化观念回到现实的历史条件中,其发展进步的动力与途径也就随之得到揭示。

马克思、恩格斯首先澄清的逻辑起点是“现实的个人”。这里的出发点不是“纯粹的存在”,不是处于抽象和幻想中与世隔绝、固定不变的个人,而是在一定物质生活条件下进行实践活动的个人。物质生产实践和现实的社会生活是人类生存的前提,也是人类一切精神活动的历史前提。离开了现实的人及其劳动实践,就不会有文化活动和精神生产。而观念文化与哲学思想是从事实活动的人们对现实生产生活的能动反映,是现实的人的物质生活的“必然升华物”。基于观念文化派生性和受动性的特点,马克思、恩格斯指出“道德、宗教、形而上学和其他意识形态”没有独立发展的历史,“不是意识决定生活,而是

生活决定意识”。^[5]传统文化的解体依赖旧的社会条件解体的发生,新观念文化的形成归根到底也是新的社会条件和社会关系兴起的结果。经由生成论的重新确认,文化发展的路径获得了规律层面的认识,传统文化发展与衍化的根本动力和原因也就得到确认。

2. 在认识论上,在社会有机体之整体中把握文化系统的独立外观,给出观念文化的结构分析方法

马克思改变了从文化系统内部,从某个片面领域批判观念文化的认识方法,而是揭示了物质生产实践的基础性位置,指出文化只是社会有机体的一个组成部分,与社会有机体其他部分相互作用,文化自身也是一个充满矛盾运动的有机系统,从而提出相应的结构分析方法。

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概括了新的历史观的特点,实际上也提出了认识观念文化的结构分析方法:“从市民社会作为国家的活动描述市民社会,同时从市民社会出发阐明意识的所有各种不同的理论产物和形式,如宗教、哲学、道德等等,而且追溯它们产生的过程。”^[6]文化作为观念的上层建筑,与经济、政治有着清晰的边界,是相对独立的存在,它以“市民社会”为认识的基础,并且同“国家”这一政治上层建筑有相区别的意义。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又对社会结构给出了经典表述:“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态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7]社会有机体是一个由里及表、可划分的有机结构,各个结构之间有着清晰的结构层次和互动关系。观念结构(社会意识形态)处于社会有机体的表层,受到“社会的经济结构”和政治结构(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的决定与影响。因为文化反映物质经济状况和法律政治制度,所以生产力和经济政治结构的运动必然带动观念文化部分要素的变化。传统文化之所以是传统,就在于其生成于旧的社会结构。

马克思、恩格斯又将结构分析方法贯彻到观念文化内部。文化是社会意识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社

会有机体中相对独立的系统,有着自身独特的组成要素。一方面,文化是一个可解析的机体,文化系统可以分为政治法律思想、道德、艺术、宗教和哲学等层次,它们“互相作用并对经济基础发生作用”,^[8]同时又处于经济的支配作用之下。另一方面,经济基础对每个层次的决定影响是有界限的。恩格斯就指出,宗教和哲学离经济基础相对较远,经济在这里“决定着现有思想材料的改变和进一步发展的方式”。^[9]经济即便要对哲学领域发挥“至上权力”,也要在先驱所提供的哲学材料范围内。因此,只有对文化内部贯彻系统分析的方法,才能认识到经济对文化的决定并不能完全抛弃传统材料,经济基础更新换代并不意味着必须对文化传统弃之不顾,相反,当社会有机体逐渐运动到新的类型,经济反而要作用于传统材料才能生成新的文化系统。文化系统内部也并不是铁板一块,不同经济类型产生的思想材料能够经过改造后相容共存,传统文化有可能为新的文化系统所运用。

3. 在价值观上,指明观念文化归根结底是阶级关系的反映,提供观念文化的根本评价标准

一个社会中占统治地位的精神文化体系,是占统治地位阶级的物质利益和政治诉求的折射。任何一个社会形态都有一种起决定性意义的物质生产方式,它决定社会诸结构的功能与性质,反映了各个组成部分具有代表性的共性,马克思将其称为“普照的光”。^[10]正是通过对具有决定性意义的生产方式的认知,人们才获得了科学划分社会形态的参照系,也才获得了判断观念文化性质的根本标准。当人们静止地看待某一社会形态的观念文化时,都能从中找到特定经济结构所规定的共性。“人们自觉地或不自觉地,归根到底总是从他们阶级地位所依据的实际关系中——从他们进行生产和交换的经济关系中,获得自己的伦理观念。”^[11]马克思、恩格斯还从分工角度分析了文化的阶级属性:物质劳动和精神劳动分离之后,“意识才能摆脱世界而去构造‘纯粹的’理论、神学、哲学、道德等等”。^[12]统治阶级内部出现了一部分“意识形态阶层”,他们代表统治阶级支配着

精神生产资料,调节着思想的生产与分配。因此,判断一个来自过去文化系统的观念要素的性质与价值,首先不应当根据其原初形态去判断,也不能以某种永恒真理或绝对理性为标准,而应当以其代表的阶级关系与利益需要为根本尺度。这也是判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当代价值与意义的根本标准。

二、马克思、恩格斯经典著述中关于传统文化的基本观点

马克思、恩格斯确立了文化的唯物史观解释原则,澄清了文化批判的前提。只有系统把握这些基本原则,散见在马克思、恩格斯经典著作中的传统文化的相关论述和基本观点才能得到梳理与还原。

1. 传统文化是随外部事实发生变化的“活的机体”

首先,传统文化绝非僵死和固化的存在物,而是随着现实运动不断发展变化的有机体。随着社会历史的发展,文化总会经历时间上由“传统”到“现代”的演替,现代文化绝非传统文化的“复制”与“照搬”。反过来讲,在新的文化系统中依然活跃的优秀传统文化必然在社会实践带动下具有同过去不同的面貌与内涵。马克思指出,范畴同它们所要反映的关系一样“是历史的和暂时的产物”。^[13]“成为希腊人的幻想的基础、从而成为希腊[艺术]的基础的那种对自然的观点和对社会关系的观点,能够同走锭纺机、铁道、机车和电报并存吗?……因而,随着这些自然力实际上被支配,神话也就消失了。”^[14]马克思在这里承认了传统文化与“一定社会发展形式结合在一起”的客观事实。今天我们所定义和运用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绝非将相应的文化要素从时间轴上“平移复制”过来,也并非试图从“过去中寻找答案”,而是对传统文化自然衍化过程的主动引导,改造已经随实践发生变化的文化要素,塑造出一个“结晶体”。

其次,明确从事现实劳动的人的主体地位,人对传统文化具有继承和改造的能动性。僵化地看待文化传统,是没有基于“现实的人”这一历史前提的结果。人们是“自己的观念、思想等等的生产者”。^[15]人民群众并不是传统的仆人,并不是被动承载传统

所赋予的一切,而是文化历史的“剧中人”,也是继承并发展文化的“剧作者”,传统文化的继承发展要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主体作用。

再次,落后观念只有实际推翻相应的现实社会关系才能实现瓦解。马克思指出:“旧思想的瓦解是同旧生活条件的瓦解步调一致的。”^[116]在现实批判的终极意义上,《共产党宣言》提出共产主义革命“在自己的发展进程中要同传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117]一方面,同传统观念的决裂建立在通过实践否定资本主义私有制和以往一切私有制的现实基础之上;另一方面,马克思、恩格斯并不是文化虚无主义者,“决裂”所指的是处于阶级运动中的意识形式,是在此基础上必然得到批判与消灭的以私有观念为核心的社会意识形态。因此,这里相决裂的观念界定在了明确且有限的意义上,并非全部意义的传统文化。

2. 传统文化是精神文化生产的必要材料

首先,文化与经济、政治、制度的辩证关系,决定了落后意识形态整体的解体并不意味着全部观念要素的共同覆灭,传统文化的某些要素能够在新的社会条件中发挥作用。恩格斯以平等观为例,指出平等的观念是一种历史的产物,它可以以无产阶级的形式出现,也可以以资产阶级的形式出现,并非仅存于某种社会形态而与其他社会结构截然对立。相反,任何一种形式的平等观念都需要“以长期的以往的历史为前提”。^[118]“自由、平等、博爱”,这一系列资产阶级革命的口号,“虽然从来没有明确表达出来,却是氏族的基本原则”,^[119]也证明了观念文化跨越社会形态而存在的可能性。

其次,过去继承而来的传统材料是精神文化生产的特殊规定与条件。恩格斯指出:“历史方面的意识形态家在每一科学领域中都有一定的材料,这些材料是从以前的各代人的思维中独立形成的,并且在这些世代相继的人们的头脑中经过了自己的独立的发展道路。”^[120]精神文化生产本身有其特殊的规定与条件,这个规定和条件就是“它的先驱传给它而它便由此出发的特定的思想材料”。^[121]恩格斯强调,现

代社会主义“同任何新的学说一样,它必须首先从已有的思想材料出发,虽然它的根子深深扎在经济的事实中”。^[122]这些继承而来的思想资料是进行精神文化生产活动时所面临的不可摆脱的直接前提,是联结精神文化生产活动的“过去”和“未来”的“历史关节”。

再次,现代社会的观念系统是综合了来自不同社会类型的文化要素的有机体。恩格斯分析了道德论形成的错综复杂的文化图谱:“由过去信教时代传下来的基督教的封建的道德”具有各种分支,“和这些道德并列的,有现代资产阶级的道德,和资产阶级道德并列的,又有未来的无产阶级道德”。这些道德由于其所代表的社会关系不同而分别以阻碍、维护或批判的态度反作用于处于支配地位的生产方式,而且其内部充斥着矛盾运动。同时,彼此之间又“代表同一历史发展的三个不同阶段”,“有共同的历史背景,正因为这样,就必然有许多共同之处”,^[123]有着继承关系。因此,观念文化的生产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凭空创造,而是要在过去继承的和代表未来的等各种要素的有机整体中创造。

3. 传统文化通过为新的意识形态体系传承获得正当性

一方面,传统文化的继承不是不受限制、凭空想象、随意发挥、照单全收的,归根结底受到阶级关系决定,总是要符合占统治地位阶级的根本需要。传统材料所发生的变化“是由造成这种变化的人们的阶级关系即经济关系引起的”。^[124]因此,传统文化中究竟哪些应该继承、哪些应该扬弃,要以什么样的方式对传统进行改造与转化,这不仅取决于对传统文化本身的理解与反思,更取决于当前意识形态建设的需要,根本上应该以占主导地位阶级的价值判断为标准。

另一方面,传统观念经由新的意识形态体系改造,获得了与过去相区别的内涵意义。当产生于落后阶级关系的传统文化置于新的意识形态体系中,就不再保留原初意义上的性质与面貌,而是作为新意识形态体系的组成要素,代表和反映了新社会关

系和阶级诉求的价值维度。意识形态对传统文化的改造,首先是包括内容与形式的阶级属性的改造。“战战兢兢地请出亡灵来为自己效劳”,是为了改造自己和周围的事物,“借用它们的名字、战斗口号和衣服……演出世界历史的新的一幕”。^[25]“在这些革命中,使死人复生是为了赞美新的斗争……是为了再度找到革命的精神,而不是为了让革命的幽灵重新游荡。”^[26]马克思虽然是在批判的意义上,但也侧面地证明了旧语言的“再度复活”实际是为了表达新的阶级利益或价值导向。对于法国革命以及启蒙运动的“第一个反应”,就是“用中世纪的、浪漫主义的眼光来看待一切”,紧接着又“去看每个民族的原始时代”,“于是他们在最旧的东西中惊奇地发现了最新的东西”。^[27]在陈旧的历史中挖掘出具有社会主义趋向的主张,从前的观念就再也不是最初的内容,而是根据新的利益诉求,用过去的资料重写出属于自己的历史文化。恩格斯指出,无产阶级平等观就从资产阶级平等观中吸收了一定要求,但它一经生成就变为“反对资本家的鼓动手段”,“实际内容都是消灭阶级的要求”,^[28]具有了与其传统材料相悖的涵义。

三、“第二个结合”对马克思、恩格斯文化观的理性贡献

中国共产党人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继承了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文化的基本思想,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使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具有了鲜明的21世纪的时代气息。同时,“第二个结合”又科学回答了后发国家如何在世界历史的潮流中独立自主地认识和对待本土传统文化的问题,给不同国家和民族对待自身传统文化以及推进自身文化建设发展提供了中国智慧与中国经验。在本文中,笔者主要从理论创新、文化发展和文明塑造方面分析“第二个结合”中蕴含的丰富的原创性和原理性思想。

1. 理论发展规律性认识的系统总结:在智慧贯通和价值融通中“让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国的”

马克思主义是随着实践变化而不断具有新形态的开放理论,对时代的深入考察与对人类社会发

展规律的深刻把握,往往通过分析具有代表性意义的民族性问题来实现。时代性并不排斥民族性,相反,理论越是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越能解决好民族性问题,就越有能力解决好世界性的问题。伴随着当代中国孕育出21世纪马克思主义的新形态,伴随着中国化时代化马克思主义逐渐以更加独特姿态和显著的原创性面貌出现,并更加自觉主动地进行体系化学理化的理论探索,面向未来的理论和制度创新必然要与具有民族性意义的本土传统材料发生深层次作用。在这个意义上,“第二个结合”系统总结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历史经验,丰富了发展马克思主义的规律性认识。

一方面,明确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发展马克思主义的本土思想宝库。马克思本人就是善于运用本土思想传统的典范,在创立科学理论时吸收了德国哲学等思想材料的合理内核。“第二个结合”给出了马克思主义本土化的一般规律,即马克思主义具有运用和改造本土思想文化的理论特质,而“激活”的目的之一是要“将中华民族的伟大精神和丰富智慧更深层次地注入马克思主义”。^[29]为了让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国的,“决不能抛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这个根脉”,^[30]发展马克思主义离不开植根本土思想文化的基本路径。同时,“第二个结合”又肯定了中华文化的特殊性。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同马克思主义具有高度契合性,蕴含丰富的智慧资源,经由马克思主义的激活与改造,提供服务于理论和制度创新的强大支撑。

另一方面,提出马克思主义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精神与价值层面的融通。“第二个结合”所实现的精神与价值融通是理论和制度创新的深层次要求,这既是文化自信自强和话语体系获得鲜明民族标识的应有之义,更是理论与制度本土生成和发挥效能的重要保障。理论本土化只有与日用而不觉的价值精神层面融通,才能贯穿话语体系、国民心理、精神面貌等更加深远和普遍的“结合”层面,从而赢得最广大人民群众的理解与支持,让人民的创造性实践与理论创新形成有效促进与互动。同样,“设计

和发展国家政治制度”也要“把握长期形成的历史传统”。^[31]从制度设计角度看,文化传统是制度生成的土壤,深刻影响制度的要素结构与形式风格;从制度运行角度看,文化传统又塑造着广大社会成员思维与行动的价值判断与风俗习惯,影响着群体对制度的内在认同与执行策略,制约着制度执行的效果和生命力。因此,制度创新深受文化传统的影响,“只有扎根本国土壤、汲取充沛养分的制度,才最可靠、也最管用”。^[32]

2. 造就新的文化生命体的理论新境界:“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现代的”

马克思、恩格斯将文化迭代问题从属于社会革命和现实经济运动的整体,这既符合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又是他们所处时代的突出论域的理论结果。随着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深入推进,具有厚重历史积淀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亟待主动加以筛选、改造和运用,以此深度促进全面的现代化建设,传统文化现代化成为一个需要单独省思的重要课题。“第二个结合”恰逢其时地对传统文化现代化给予规律性的指导。

横向上,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华从原有文化系统中分离筛选出来。“第二个结合”所针对的传统文化包含政治社会思想、人文精神、道德伦理、哲学宗教等各方面。这些文化因子有一部分自然流淌至今并或隐或显地发挥作用,还有一部分需要根据实践导向在传统文化思想宝库中进行主动挖掘。这两个部分都需要在科学理论指导下经历分离与汰选过程。筛选标准首先是由马克思主义指导的人民性的价值尺度,即是否符合人民群众的价值共识或实践需要;其次是由此决定的一般性标准,即是否满足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发展的普遍性要求,如“适合于调理社会关系和鼓励人们向上向善的内容”。^[33]两项标准的具体内容随着当代中国实践而发展变化,以此剔选出传统文化中具有时代价值的“优秀”部分。

纵向上,弥合“传统”与“现代”关系,将旧社会结构生成的文化精华置于新的文化生命体中加以改造。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民族

精神“有其自身的连续性和稳定性”。^[34]就变化的一面,当小农经济和相应的政治经济制度解体覆灭时,维护封建统治的意识形态整体也会随之失效和解体,人们日用而不觉的一些文化观念因为不再受过去的结构关系决定而不再保有原来的功能和意义,“封建礼教”“伦理纲常”等注定要丧失它的整体外观。就连续性与稳定性的一面,来源于落后生产关系的观念文化一旦脱离原有意识形态体系,就有可能析出其中具有普遍意义的观念要素或对新社会结构仍具有规范性意义的要素,经过对其改造重构,置于新的“普照的光”中发挥作用。

3. 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独创思考:指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文明形态的内在联系

文明塑造是“第二个结合”更为深远的层面,以更加宏阔的历史关怀落实到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建设中,又以更加宽广的系统视野聚焦于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全局性谋划、整体性推进,回答了文明形态的文化支撑、主体建构与未来面向等课题。

首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文明塑造的必要资源。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有很多重要元素,共同塑造出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35]传统文化是一种历史性存在,没有历史性的文化积淀就缺乏构成文明的基本要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对本民族的独特文化资源进行价值取舍的结果,没有具有时代价值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华文明也不具备代表进步意义的基本条件。中华民族几千年来辛勤实践凝结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神内核,构筑了中华文明的基本样态,诠释了中华文明独特的宏远理想、精神情怀、行为方式和出场面貌,尤其是延伸到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各领域,规定着中国式现代化有基于自己国情的特色。“第二个结合”通过梳理与总结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元素、基本问题与概念范畴,体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文明特性和中国式现代化独特价值观的支撑与孕育,从而带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渗入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内在环节,涉及经济社会发展的各个方面,指明了观念上层建筑促进社会有机体之整体发展的科学路径。

其次,将中国道路扎根于中华文明深厚基础,巩固文化主体性。中华文明侧重于空间维度,是在中华民族生长与活动的空间内逐渐生成和筛选出的文化因子所支撑的文明成果,规定了在这一空间内进行的文明再造离不开其本身的整体范畴。中国道路固然有全新的内涵与面貌,而“第二个结合”又明确其与中华文明置于“同轨”之中,强调中国道路的成就离不开中华文明的延续与哺育,确证了其在民族性的比较意义上的特殊性。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文明的集中体现与文化支撑,文化主体性是中华民族主体性的文化表征,^[36]只有承认并强化民族的文化主体性,才能保证道路的连续性与稳定性。因此,“第二个结合”将文化继承和发展问题逐层次升华为关乎全局和长远的道路选择问题,提升为影响甚至规定现代化发展方向的宏观战略问题,对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运动和社会历史发展动力等问题有原理性的创新认识。

再次,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彰显文明新形态的底气与可能。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既指出了文化主体性,又规定了隶属时代范畴的现代性,具备强烈的现代性批判意识和现实关怀,直面“人类向何处去”的时代课题。对这一时代课题的解答,必然导向超越西方式现代化的文明形态的新文明结果。资本主义现代化以资本逻辑为根本导向,片面追求经济增长和利润最大化,在经济、生态、国际环境等诸多方面不断暴露出西方文明的危机。^[37]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蕴藏着解决当代人类面临的难题的重要启示。”^[38]“第二个结合”一方面拥有超越资本逻辑的科学思想指导,在此基础上又包含了对中华文明的特殊性探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有中华民族五千多年文明道路的历史纵深,凸显文明差异中具有时代意义的特性,尤其是有益于克服资本弊端的整体性特征。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有同科学社会主义价值观主张的高度契合性。天下为公、民为邦本、为政以德、革故鼎新、任人唯贤、天人合一等传统思想文化结晶融入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话语体系,把科学社会主义熔铸于21世纪中国的文化

结构和宏阔愿景中,成为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超越西方资本主义文明的历史根脉与深厚底蕴。“第二个结合”是东方大国独立自主探索适合本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理论升华,创造性地发展了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认识,为广大发展中国家迈向现代化过程中正确对待历史文化传统树立了光辉典范,为人类对更好文化形态的探索提供了中国方案。

参考文献:

- [1][29][30]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六次集体学习时强调 不断深化对党的理论创新的规律性认识 在新时代新征程上取得更为丰硕的理论创新成果[N].人民日报,2023-07-02.
- [2]王易,倪圣茗.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实践进路[J].思想理论教育,2022(5).
- [3]胡海波,郭凤志.马克思恩格斯文化观研究[M].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2013:97.
- [4]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601.
- [5][6][12][15]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525,544,534,524.
- [7][16][17][25][26]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591,51,52,471,472.
- [8][9][20][21][27]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668,600,658,599,284.
- [10][14]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31,35.
- [11][18][22][23][28]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99,113,19,99,112-113.
- [13][2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415,312.
- [1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416.
- [31][32][33][34][38]习近平著作选读,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3:261,262,278,241,278.
- [35]习近平.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J].求是,2023(17).
- [36]陈方刘.“两个结合”与中华文化主体性的巩固[J].思想理论教育,2023(7).
- [37]段妍,刘冲.中国式现代化:一种全新的人类文明形态[J].思想理论教育,2023(9).